

许明龙
著

Mois Octobre 1713.

matin m^r. Doublain est venue
peupera. Demerant rici de joui
abit s^t. d'ntoigne entre deux cordonie
ocal. le voⁱ.
campagne. L.
firi les écrit des echipses p^r. m. Savain.
pou Xhen chout mist. nouchou.

黄嘉略 与早期法国汉学

Arcade Huang et le début de la sinologie française

中
华
书
局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许明龙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许明龙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ISBN 7 - 101 - 04110 - 8

I. 黄… II. 许… III. ①黄嘉略—生平事迹②黄嘉略—关系—汉学—研究—法国 IV. ①K825.5②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288 号

责任编辑: 张 进

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许明龙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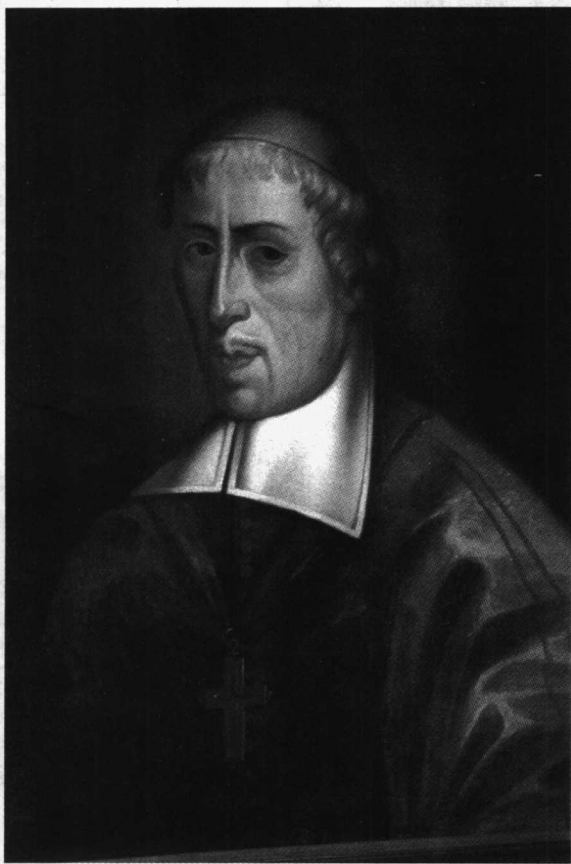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2 印张 · 262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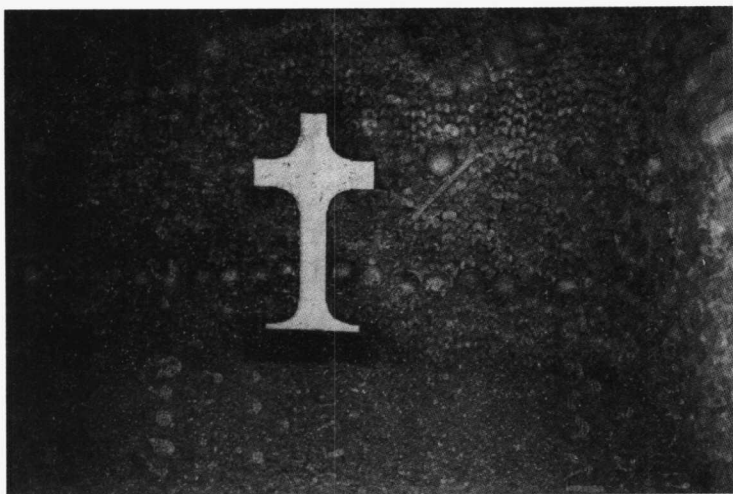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22.00 元

ISBN 7 - 101 - 04110 - 8/Z · 498



梁弘仁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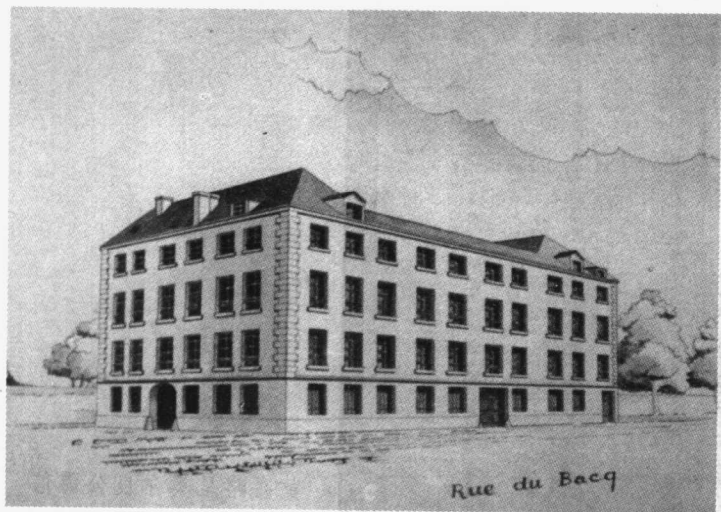
PBH 50/04



巴黎地下尸骨场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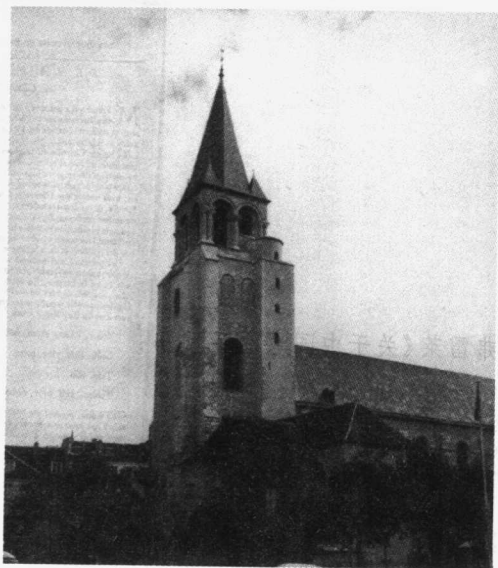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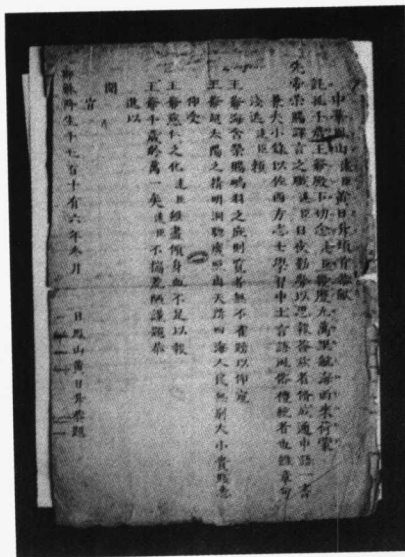
比尼昂像图片（源自《法国图书馆史》——Jolly, Claude,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Promodis,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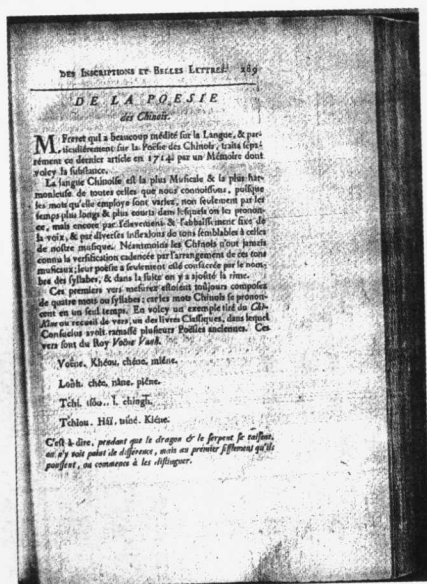
18 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外景

圣日耳曼教堂——
黄嘉略多次在巴黎
日记中提到，圣日耳
曼教堂离家不远，他
们夫妇俩都常去那
里参加宗教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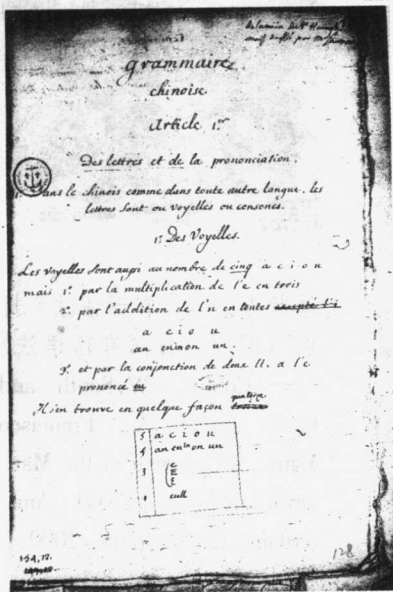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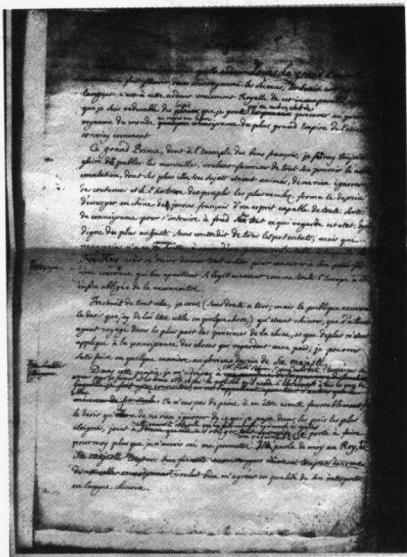


黄嘉略呈奥尔良公爵信
(文见本书 P135)



弗雷莱《关于中国人的诗》
学术论文的摘要第一页，
论文中以逐字注音的方式
记录了两首中国诗歌，图
中可见其中一首。(文见本
书 P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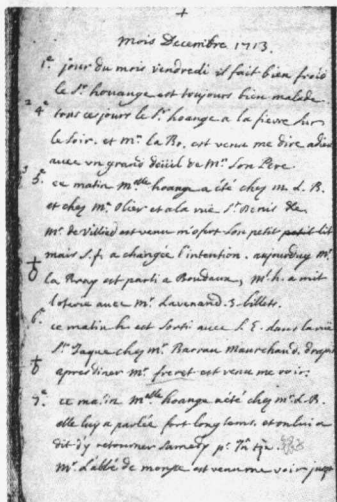
黄嘉略所著《汉语语法》一书的序言首页（文见本书附录四）



黄嘉略所著《汉语语法》一书中介绍“元音”的部分



孟德斯鸠像



黄嘉略巴黎日记之一页，其中接连两天提到了孟德斯鸠为父丧而返乡一事。(文见本书 P274)



原版万济国《官话语法》封面（图片源自《官话语法》—— Coblin, W. South and Levi, Joseph A., Francisco Varo' 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msterdam, Philadelphia, 2000.)

前 言

在一些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不止一次地见到过 Arcade 这个名字,特别是艾丹妮(Danielle Elisseff - Poisle)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先后出版了两部有关这位中国人的著作后,Arcade 这个名字频频出现在更多的西方汉学家和中西关系研究者的著作中。就我所见,Arcade 是在法文中的常见拼法,在其它西文著作中则常常被写作 Arcadius 或 Arcadio。他姓黄,有人按照如今的汉语拼音写作 Huang,有人依照过去的习惯写作 Hoang,而在他生前,除了 Hoang 以外,还有人写作 Hoang、Hoangh、Hoange 和 Ouang。尽管许多西方学者对于 Arcade 已不感到陌生,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Arcade 至今依然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1986 年之前,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位学者曾经提到过他,而且只知其姓,不知其名。1986 年我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依据我所查找到的可靠资料,称他为黄嘉略。这个名字从此被国内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们普遍接受,不断出现在学者们的著述中;在一些国内或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时而也能听到这个名字,这让我颇感欣慰,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位平凡而又不同寻常的小人物,终于在将近三百年之后开始为他的同胞所认识和肯定了。

然而,嘉略其实不是黄先生的本名,而是他受洗时传教士为他起的西文教名 Arcade 的汉译。他的一封亲笔信表明,他的本名是

黄日升。那么为什么不称他为黄日升而称他为黄嘉略呢？原因是我在1986年发表第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时，还不知道他的本名，而当我发现他的本名时，嘉略这个名字已经被学界接受，开始出现在书刊中了。尽管按理说我们应该改称他为黄日升，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教名是洋人起的洋名，虽然已经译成中文，叫起来还算顺口，毕竟还是有些不伦不类。可是，考虑到黄嘉略这个名字已经被学界接受和习用，如果骤然改称黄日升，可能会令人误以为这是两个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斟酌再三，我决定继续称他为黄嘉略，因为归根结底，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只要大家都知道而且承认这个符号所代表的那个人，至于这个符号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大号国栋、国梁的人未必是旷世奇才，小名阿狗阿猫的人不见得没有丰功伟绩。

2000年仲夏我再次在巴黎小住，从1982年首次访问这座以花都闻名于世的美丽城市算起，这次大概是第七次了。该看的名胜古迹大多已经看过，最初的那种新鲜感早已消失，巴黎的景色依旧婀娜多姿，却难以再像当初那样令我激动了。然而，有一个景点以前不曾去过，这次非去不可，那就是当费尔－罗什罗地铁站附近的地下墓地。倒不是因为地下墓地的景色独好，而是因为黄嘉略的遗骨很可能就在那里。黄嘉略生前居住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卡耐特街，离他住所最近的公共墓地在塞纳河彼岸，距大菜场（Les Halles）不远处。我估计，以他的家境和身份，他死后很可能下葬在那里。十八世纪下半叶，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那个公共墓地上建起了房屋，掩埋在那里的死者全部移葬他处，无人过问的遗骸都被遣送到刚才提到的那个地下墓地。女儿是黄嘉略的唯一亲人，可是她在1735年20岁上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就是说，她来不及为他父亲迁坟改葬就死了。因此，如果没有意外的原因，黄

嘉略必定随着成千上万的亡人移居到地下墓地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望他,尽管我并不知道他是否确实安息在这里,况且,即使他确实长眠在这里,我也根本无法从数十万具遗骸中把他辨认出来。地下墓地由若干条曲曲弯弯的小径组成,长度将近两公里,小径两侧各有一道用骸骨垒成的矮墙,所有遗骸都已经被拆散,分门别类地集中安放,这边是腿骨,那边是臂骨,另一个地方堆的是骷髅。沿着漫长而弯曲的小径,我边走边看边想,除了我还有谁知道,这里可能长眠着一个中国人?谁曾经专程前来探望他?他生前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孤苦无助地生活了十余年,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而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死后和数十万具遗骸寂寞地安息在漆黑而潮湿的地下,不但从来没有人来为他扫墓,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他。作为他的同胞,我来了,把我对长者的尊敬和对朋友的怀念真诚地奉献给他。但愿他彼岸有知,能够感到一丝淡淡的欣慰。

十六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随着商船和战舰来到中国,由此拉开了历史上又一个中西交往高潮的序幕。从十六世纪末开始的百余年中,数百名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传播福音,其中不少人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的甚至终老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同一个时期中,去到欧洲的中国人却寥若晨星,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十八世纪以前,曾经踏上欧洲土地的中国人只有三位:1645 年跟随法国传教士罗历山(Alexandre Rhodes, 1591—1660)赴欧的郑玛诺;1651 年跟随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前去罗马的青年教徒,此人在西文文献中名叫 Dominique, 他的中文姓名没有留下记载;1684 年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游历英、法等国的沈福宗。郑玛诺离开中国时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1651 年到达罗马后,在罗马

和波洛尼亚等地的耶稣会学校学习,结业后担任教职,1662年前往葡萄牙,候船返回中国,四年后终于成行,1668年返抵澳门。卫匡国的随从是福建省福安县的一位青年教徒,在欧洲期间备受欢迎,据说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曾亲自接见他。此人并未随卫匡国返回中国,后来不知所终。沈福宗的名气远远超过上述两位,他在法国逗留期间,曾在凡尔赛宫晋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并用拉丁语回答国王的询问,为国王表演用筷子进餐。在与法国公众的交往中,他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展示了孔子的画像,表演用毛笔写字。1687年沈福宗随另一位耶稣会士到达英国后,在牛津与著名学者海德(Thomas Hyde, 1636—1703)多次交谈,内容涉及汉语、中国的地理和度量衡以及围棋等,大英图书馆至今依然保存着海德与他的谈话记录。进入十八世纪后,有一位中国人于1704年随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抵达巴黎。巴黎国家档案馆中的一件文献简略地谈到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中国人,说他在讲法语时,总是依据东方人的习惯,用人称代词加动词不定式组织句子;他很喜欢向法国人展示他的中国服饰,腰间挂着许多小袋子,里面装有烟叶、小刀和称银子的小秤等物件。黄嘉略虽于1702年年底抵达巴黎,但仅作一个多月停留后就继续前往罗马,当他从罗马回到巴黎时已是1706年,所以,尽管他是十八世纪抵达法国的第一位中国人,但就他实际发挥中国人的作用这一点而言,我们宁可把他看作十八世纪来到法国的第二个中国人。

黄嘉略与在他之前来到欧洲的中国同胞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他并非来去匆匆的过客,而是从1706年起就定居巴黎,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返回中国;其二是他与法国女子通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就这两点而言,他是历史上的第一人。不过,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国定居并娶妻生子的第一位中国人,那就没有为他树碑立传的

必要了,事实上,他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是用法文编写汉语语法的第一人,他是用法文编纂汉语字典的第一人,他是将中国小说译成法文的第一人,他是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给法国的第一人,等等。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著述和活动都很平常,不值得传扬和夸耀,他的业绩因而也就不值得称道。然而,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结论就大不一样了。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神甫在谈及黄嘉略时写道:“在我们的汉学领域里,黄嘉略的到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①荣振华神甫在中国居住多年,而且对早期中国与法国的文化交流进行了长期研究,撰写了多部名著,他是在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黄嘉略作出这个评价的,应该说很有份量。可惜,他并不代表更多法国学者的意见。十九世纪著名法国汉学家阿伯儿-雷慕莎(Abel-Rémusat, 1788—1832)谈到沈福宗和黄嘉略时写道:“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极少,王家学院的任何一个学生学习半年之后,对中文书籍所作的摘录,都能超过他们一百倍。”^②十九世纪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对黄嘉略的评价也很低:“他于1716年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些价值不大的材料。”^③他们之所以对黄嘉略的评价很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影响,因为,这位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以不屑的口吻谈

① J. Dehergne, *Voyageurs chinois venus à Paris au temps de la marine à voile et l'influence de la Chin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IIe siècle*, *Monumenta Serica*, (23) 1964, p. 372—397(376)。

②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I, p. 261, Paris, 1892。

③ Henri Cordier, *La Chine en France en XVIIIe siècle*, p. 132, Paris, 1910。

论黄嘉略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嘉略的任何著述都没有获得发表的机会，后人除非到图书馆去阅读他的遗稿，否则无从了解他的业绩，然而，有几个学者舍得花费时间去阅读这些“价值不大”的遗稿呢？于是，黄嘉略就渐渐被人遗忘了，直到法国汉学家艾丹妮再次发现这位“小中国佬”（Petit Chinois）。

帮助我认识黄嘉略并下决心对他进行研究的正是艾丹妮。说起来真惭愧，我虽然是黄嘉略的同胞，二十年前对他却是一无所知。1982年第一次访问巴黎时，在一个社区图书馆里读到了艾丹妮的《尼古拉·弗雷莱（1688—1749）》，一位十八世纪人文学家对中国的思考》（Nicolas Fréret（1688 - 1749），*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书中对黄嘉略的介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油然而生。依据作者所提供的资料来源，接触了尘封已久的黄嘉略的手稿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后，我深信这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并且介绍给公众的人物。他虽然没有伟大的建树，也没有留下不朽的著作，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勤奋耕耘，为在欧洲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任何理由让他的名字永远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自此之后，每次出访法国。我总要抽时间四处搜寻他的手稿和有关资料，除了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方外传教会档案室等处外，我还两次专访波尔多，查找孟德斯鸠的手稿，拜谒他的故居拉布莱德古堡。屈指算来，我对黄嘉略的研究已经持续二十年了，当然，对他的研究并非我的全部工作，甚至不是主要工作，然而，他始终是我最为关注的课题，我从未放过任何能推进这项研究的机会。这些年来，先后发表了几篇介绍和研究他的文章，还曾两次向国际研讨会提供了有关他的论文。一篇文章毕竟容量有限，无法把有关他的各种事情统统讲清楚，而且鉴于

他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因而几乎在每篇文章中,都不得不从介绍他的姓名、籍贯和生平说起,所以内容往往多有重复。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为他写一本书的念头早在十余年前就产生了。然而,愿望和现实之间总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几次提笔草拟提纲,总觉得资料尚嫌不足,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撰写有关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时,通常有许多第二手或第三手资料可以参考,为黄嘉略立传则不同,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书籍和资料可以借鉴,必须全部依靠第一手资料,即黄嘉略的遗稿以及相关的档案或手稿。为此,必须在巴黎逗留至少数月,以便到国立图书馆等处去认真阅读那些二百余年以前的手稿。2000年和2002年,我有机会两度访问法国,阅读、抄录和复制了不少以往由于疏忽或时间不够而来不及搜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终于实现了宿愿,写成了这本多年想写而没有写成的小书,把它奉献给黄嘉略的同胞和曾经帮助过他的法国人民。

艾丹妮女士从比尼昂教士那里借来了“小中国佬”这个称呼,用来称呼黄嘉略,我觉得十分得体,因为黄嘉略确实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大人物,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为他立传呢?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曾经有过黄嘉略这个人,并且晓得他曾经为帮助法国人了解中国出过力,做了事,将来无论哪位学者专家撰写中法两国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以及法国汉学史时,都不要忘记他,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他几句。果真如此,我就心满意足了,黄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我以往发表的文章和书大多以叙事和考证见长,资料比较多,议论比较少,因而被同行们戏称为“抛材料”。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不是史学科班出身,理论水平比较低,发潜阐幽不是我的强

项；其次因为我觉得，史学研究应该以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第一追求，在弄清基本史实之前以少发宏论为好，以免一旦发现史实有误，宏论一垮到底，与其把大楼建在沙滩上，莫如踏踏实实做一点基础性研究，哪怕只搞清一件小小的史实，也有助于推进史学研究。材料可能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找到或搞清的，但应该也必须由大家共享，只有这样，整个学科才能有较快的发展。过去我抛出的材料常有被分享的情形发生，我为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本书披露的材料同样有可能被同行分享，果真如此，我又将感到万分荣幸。只是我想在这里向未来的分享者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您在大作中使用本书提供的材料前，最好再核对一下，以免因我的疏漏而给您带来麻烦。

陈志超先生早在 1985 年就精心审改我的第一篇关于黄嘉略的文章，并介绍给《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刘洁修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多次提供准确的线索，帮我寻找到了没头没脑的中文资料，居间穿针引线的是刘老先生的公子刘巍先生。杰出的孟德斯鸠专家戴格拉夫（Louis Desgraves）去世前不久，费心为我找到并复印了 1713 年《文雅信使》上载有中国诗歌的那篇文章。法国朋友索巴德（Patrick Sautreuil）多次为我从巴黎国立图书馆复印资料，并赠送书籍。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 - Henri Durand）热情地为我修改用法文撰写的关于黄嘉略的文章，并为我查找和复印资料。徐斯年先生为我详细解答中国诗歌的相关问题，杨洪为我在美国购买万济国的《官话语法》，汤漪为我修补梁弘仁的画像照片；韩琦先生、顾卫民先生、张顺洪先生、韩秉方先生、徐广存先生对于我为黄嘉略立传一事，极表赞同，给予鼓励和关心。我愿借此书终于出版的机会，向以上这些中法两国的亲朋好友表示深深的谢意。